

再製與變異

□ 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

李貴民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

中文摘要

越南與中國之間的往來頻繁，佛教文獻的交流幾乎沒有間斷，除了早期越南曾經有過印度僧人在當地翻譯佛經之外，越南佛教主要還是依靠漢傳佛教典籍。大概到了明朝正統年間（1436-1449）之後越南佛教才開始振興，隨著越南後黎朝（1428-1789）進士梁如鵠（1420-1501）兩次北使後，將刻書技術帶回，才使得越南官方刻書技術漸漸成熟，後來也帶動了各地寺廟的漢傳佛教典籍重刻的進行。

然而，這些佛經典籍的刊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面貌出現，透過觀察其刻書的過程，可以了解漢傳佛教典籍如何適應越南當地人民與社會，以及後來的再製與變異的過程，呈現出越南僧人對於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其背後所顯示的深層意義與越南佛教的本土化息息相關。

關鍵詞： 越南、漢傳佛教、佛教典籍、刻書

Reproduction and Alt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Vietnam

LEE, kuei-min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Buddhist texts have been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most continuously. Vietnamese Buddhism has reli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except for translations done in Vietnam by Indian Buddhist monks in the earliest period. A revival began around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 during the Later Lê dynasty (1428-1789), when the Imperial Scholar Lê Lương Như Hộc (1420-1501) brought the technology for woodblock printing back to Vietnam after he was sent on two delegations to China. Following this, woodblock printing was officially adopted, which facilitated the recarving of woodblocks and the reprinting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temples throughout Vietnam.

The way these Buddhist texts were printed differed over time. By understanding how the carving and reprinting was undertaken, we can see how Chinese Buddhist texts were adapted by local people and society in Vietnam. Additionally,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and alteration shows how

Vietnamese monks adapted Chinese Buddhist texts for their own use, implicating deeper connections with the localization of Vietnamese Buddhism.

Keywords: Vietnam, Chinese Buddhism, Buddhist Texts, woodblock printing



一、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輸入與刊刻

長久以來，越南佛教典籍即隨著漢人統治而流入，加上隋唐時期以前，越南北部仍是外國商船進入中國的一個選擇，佛教的交流也在當地產生了影響，有些僧人甚至在當地翻譯佛經，成為當時的佛教中心之一。¹中越之間的佛教往來互動頻繁，但是在漢傳佛教典籍輸入這一方面，則要到了宋朝時期才有比較明確的記載。

從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到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間，中國官方一共向越南頒賜了九次大藏經，但是在這將近三百年間，越南未有仿刻佛經的紀錄。²因此，這些頒賜到越南的佛教典籍雖然看起來數量甚多，但是由於越南天然氣候條件的影響，此類紙質佛經典籍保存並不容易，加上陳朝（1225-1400）之後戰亂頻繁，首都河內歷經數次兵火破壞，典籍難以保存，即使分散保存於各地寺院的佛經，也因為長年累月的耗損與戰事波及，幾乎亡佚殆盡。目前在越南漢喃院、越南國家圖書館，以及喃字遺產保存研究會等主要保存佛教典籍的機構，幾乎都沒有收藏明朝以前的漢籍佛經。所以，僅靠中國官方頒賜大藏經是難以維持越南長期擁有佛教典籍，故才會在三百年間卻沒有仿刻佛經的疑問出現，這應與越南刊刻印書的技術較為落後有關。雖然，陳英宗興隆三年（1295）二月時，元朝使節蕭泰登（1266-1303）來越，朝廷派遣員外郎陳克用（生卒不詳）等人向其取回大藏經後，將其留在天長府刊行副本。興隆七年（1299）英宗又下令印行佛教法事、道場、公文格式，頒

■

※ 收稿日期 2019.7.1，通過審稿日期 2019.8.25。

¹ 釋清決，《世界佛教通史：第十一卷 越南佛教（從佛教傳入至公元 20 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9。

² 劉玉琚，《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97。

布天下。³但是，相關刊行副本以及印行法事新文的書籍文獻並未流傳於後世，故難以確認其內容，對於刊刻技術也無所知，此後一百多年間越南的刻書活動幾乎衰退至隱沒不見。

大概到了明朝正統年間（1436-1449）之後才開始振興，隨著越南後黎朝進士梁如鵠（1420-1501）兩次北使時，曾「與一刻字工為友，往來其家，公細認其妙，鞭回以藝教本鄉及柳幢民」，⁴將刻書技術帶回越南，教導紅蓼鄉的居民之後，才開始蓬勃發展，附近的柳幢鄉也學習此技術，成為後來越南兩個很重要的刻書中心，目前保存下來的早期越南佛經中有些保存刻有「紅蓼梓人奉刊」或「柳幢匠人奉刊」的字樣。⁵梁如鵠後來甚至被尊稱為「梁大王」，在越南漢喃院保留有一份名為《梁大王》的手抄本，內容記載海陽省嘉祿縣紅蓼社人梁如鵠成為刻印大王的故事，文中略述梁如鵠在黎太宗（1434-1442）壬戌科（1442）及第為探花，後出使中國，學會刻印技術，回國傳授相關技藝於紅蓼、柳幢兩社人，被當地人立廟供奉並被封為梁大王，後世歷代皇帝為表彰其功績，頒賜有十道敕封，肯定其所帶回的刻書技術對於越南所產生的重大影響。⁶

所以，從十五世紀初期開始，越南的刻書技術又重新發展起來，其中許多佛經得以保留至今，梁如鵠具有重大的貢獻。目前越南當地所保

³ 阮蘇蘭著、阮黃燕譯，〈越南封建時代國立圖書館略考〉，《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冊 2，臺北：樂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45-264。該文作還推論，陳朝時期，不僅只有天長府，全國應該還有其它可以收藏和刻印書籍的地方。

⁴ 《梁大王》抄本，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v.1845，頁 2。

⁵ 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頁 98。

⁶ 《梁大王》抄本，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v.1845。文末並附載歷代關於梁如鵠的敕封十道，其年份分別為景興四十四年（1783）、光中五年（1792）、景盛四年（1796）、明命二年（1821）、紹治四年（1844）、嗣德三年（1850）、嗣德三十三年（1880）、建福元年（1884）、同慶二年（1887）、啟定九年（1924）。

留的刻本漢文佛典要晚到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才大量出現，但不能否認的是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間，越南刻書技術是持續在發展中，其主力是以官刻工作為主，例如：紹平二年（1435）刊行《四書大全》、光順八年（1467）頒五經官板、洪德十四年（1487）更在文廟修築書板庫存放書板，顯示當時已經有一批成熟的技術人員，後來各地寺廟佛經的刊刻可能得力於此。越南漢喃院仍保有十七世紀中葉留下來的佛經刊刻本，例如：憇山德清（1546-1623）述義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今存印本一種，為越南比丘尼妙慧（生卒不詳）重印於黎盛德二年（1654）。⁷而《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是罽賓國（Kashmir）僧人佛陀多羅（約七世紀）漢譯的《大方廣圓覺了義經》輯註本，內有裴休（791-864）、宗密（780-841）序，由臥雲主人明如（生卒不詳）於黎永壽三年（1660）重印。⁸又如《萬法指南》則是一本越南早期所印行的佛教名詞字典，為明代雲水沙彌（生卒不詳）所撰，永壽三年（1660）黎氏玉情公主（生卒不詳）重印。⁹還有《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此經書是武江縣扶朗社永福寺重印於景治七年（1669）。¹⁰以上這幾本佛經印成於十八世紀以前，這與之前越南向中國求取大藏經的來源不同，主要是因為越南進入中興黎朝（1533-1789）後，隨著鄭阮推翻篡位的莫朝，呈現南北分裂，變成開始延請中國高僧到越傳法，到了十八世紀甚至有越南禪師前往中國求取佛經。¹¹雖然，不像之前是整部大藏經傳入越南，

■

⁷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直說》，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01。

⁸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27。另見編號 AC. 396，也是《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但為無住比丘清壘重刻於嗣德三十六年（1883），至靈縣安寧社永慶寺藏版。

⁹ 《萬法指南》，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53。

¹⁰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5。

¹¹ 參見拙著，〈越南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初探〉，《佛光學報》新 6：1，頁 285-286，文中提及越南目前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多數是由當時前往越南的高僧所帶去，或是後來越南禪師前往中國取回。

但是卻也讓少量的漢傳佛典不斷地輸入各地的寺廟，這些寺廟為了保存得來不易的佛經，會在財力較為充裕的狀況之下，重新刊刻佛經，所以越南現今所保存的經書經常有多次刊刻的序文說明。

至此，越南佛經的刊刻工作基本上轉移至各地的寺院，根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的資料，可以統計出下列曾經刊刻佛經的廟宇：¹²

表一 越南刊刻佛經寺院位址分佈一覽表

京都	報恩寺、鎮國寺、春成妙諦寺。
河內省	南昌縣細川社寶龕寺、壽昌縣安宅村闡法寺、青池縣黃梅總盛烈社大悲寺、常信府上福縣華林寺、懷德府盛光社福慶寺、上福縣羅浮社福寨寺、蓮池海會寺、壽昌縣舊樓村蓮池寺、懷德府永順縣佳景坊洪福寺、環龍縣泰河邑維仙縣龍隊山寺、西湖地靈寺、永順縣安阜坊鎮北寺、嘉林縣金山總重嚴寺、慈廉縣資慶寺、慈廉縣聖主寺、懷安縣香蹟寺觀音閣、永順縣安朗寨昭禪寺、青池縣天福寺、常信府上福縣五陵和平陵二社崇福寺、懷德府壽昌縣順美總報天寺、上福縣平陵總武陵社陶舍村雲羅寺、金華縣雁塞社淨明寺、生祠鋪玉壺寺、安廬社興焰村罷靈寺、欽天社美光寺、黃梅社峨嵋寺、蒲山社大覺寺、報天坊靈光寺、宜蠶坊金蓮寺、白梅坊蓮派寺、富川縣多寶寺、佛跡山般若庵、安朗寺、圓明寺、覺華寺、李國師寺、蓮華寺、婆娑寺、演慶寺、玉山寺、長安寺、靈山寺、同光寺、含龍寺、報應寺。
海陽省	南策府至靈縣安寧寺、東潮縣安子龍峒寺、東潮縣安子山憐洞寺、建瑞府安論總華津寺、東潮縣河雷社瓊林寺、東潮縣安林端嚴寺、南策府青河縣先烈總先烈社大慶寺、嘉祿縣褒中總曾上社寶塔寺、嘉祿縣厚俸社光明寺、安陽縣福光寺、平江府錦江縣覺靈寺、東溪社月光寺、昆山鎮玉寺、重光寺、大心寺、福隆寺、養蒙寺、光慶寺。

¹²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的資料目前已經數位化，可至「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網址：<http://140.109.24.175/pasweb/default.asp>，2019/4/22。本圖表由筆者自繪，內容並參見劉玉琄，《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頁109-111。

興安省	多禾社巴魯寺、美豪府慶雲寺。
北寧省	慈山府武江縣大壯社同人寺、慈山府桂陽縣寶穀寺、桂陽縣覽山社寶光寺、順安府超類縣沂江社大光寺、徐山府武江縣扶朗社福隆寺、徐山府桂陽縣圓覺寺、徐山府桂陽縣含龍寺、武江縣棟高寺、仙遊縣芙泥總義址社福田寺、東岸縣富市社興福寺、武江縣春雷社興福寺、武江縣扶朗社永福寺、武江縣靈山寺天台寺、天福府越安縣仙羅社賜恩寺、諒江縣賜恩寺、嘉林崇福寺、大豐社延福寺、報恩寺、崇恩寺、寧福寺、永嚴寺、復興寺、靈聰寺、大悲寺。
南定省	海後縣桂海總蓮池寺、親光寺、桂芳寺、真奉庵。
山西省	國威府丹鳳縣劉舍社江舍村寶福寺、石室縣石舍社真龍寺、三陽縣靈寶寺、石室縣光福寺、三陽縣某寺、巔山寺、柴山寺、佛跡寺。
承天府	香水縣平安邑慈曇寺、香茶縣富春山國恩寺、香茶縣楊春山祇園寺。
太平省	建昌府真雲寺、舒池縣無礙總外朗社福勝寺、前海縣靈山寺、武仙縣神光寺、陶舍社祝聖寺、福慶寺、靈應寺、仙香寺、真靈寺。
邊和省	護國寺。
河南省	里仁縣延靈寺。
定祥省	建安府隴仙寺。
寧平省	安慶府嘉慶縣安豐總興龍寺。
省分不詳	丹會社寶靈寺、萬慶寺、安樂寺、細川寺、純美寺、蓮宗寺、建安寺、華嚴寺、寶幢寺、常福寺、福園寺、吉靈寺、靈通寺、龍寶寺、漏澤寺、樹德寺、鑄佛堂、法雨寺、東門寺。

基本上這些資料是來直接抄錄自經書封面、序文或是牌記等的紀錄，並沒有追溯其確切的刊刻位址，所以會有省份不詳的情形出現。此外，這些廟宇是根據現存於越南漢喃院的經書資料統計，或許會有些廟宇曾經刊刻經書，卻因為沒被收錄或是已經完全亡佚而有所遺漏，上述

統計內容可能僅能反映某一部份越南佛經刊刻的狀況。另外，還應該注意的是，其中有些廟宇只是出錢主持倡印，但是實際上刻經板卻是藏在其他寺廟，例如：上述的《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上記載是由瓊林寺無憂比丘寂識（生卒不詳）倡刻，但經書版卻放置於安寧社寺。¹³如果想透過這些廟宇的資料去重新認識目前典藏的佛經經板，必須要注意上述這些問題。

十七世紀以降，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刊印隨著刻書技術的成熟，以及各地寺廟也擔負起刊刻經書的工作，而得到蓬勃發展。但是，因應不同時代的需要，這些傳入越南的漢傳佛教典籍在內容上可能會出現部分的修改。

其一為長期存在的經文避諱規定。越南在自主時期之後，也跟中原王朝一樣，會由朝廷頒佈避諱字，所以，越南阮朝（1802-1945）之前，在當地重刊的佛經都會有特定避諱字的內文修改。

其次，是所謂本土化的問題，其中在越南以喃字的出現影響最大，它不僅將儒家典籍進行喃字化，以利當地越南知識份子學習，甚至影響到俗文學的普及，當然也使得有些漢傳佛教典籍被翻譯為喃字。

漢傳佛教典籍在越南再製過程中，所出現最大的修改、變異是所謂的「仿佛經」的出現，這類的佛教典籍應該不算是漢傳佛教典籍，但是由於是模仿原本佛教典籍的寫作格式出現，甚至假託古代著名譯師之名，意欲使人認為也是傳統佛教典籍，其所呈現的狀況應該是漢傳佛教典籍在越南的最大變異。

■

¹³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96。此處的安寧社寺，是指至靈縣安寧社永慶寺。

二、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變異

對於所謂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變異過程中，避諱字的修改與喃字化是無法區分時代的先後，因為避諱字是受當地政權頒布的法令所規定，不同的統治時期必會有不同的官方避諱字出現。¹⁴而喃字化的現象則是與越南知識份子的生活和民族情感有關。

（一）越南漢傳佛教典籍喃字化

自秦漢以來，漢字隨著中原文化不斷在越南傳播，漸漸的有一些越南知識份子開始嘗試以漢字為基礎來創造新的文字，記錄越南語音的詞彙，這就是所謂的「喃字」。關於喃字最早產生的年代，目前意見不一。¹⁵有學者認為西元八世紀左右，喃字已經開始出現，只是當時並不普及。¹⁶到了十三世紀時，越南的知識份子開始使用喃字進行文學創作，其中最著名的文學作品就是阮攸（1765-1820）在十九世紀所編著的《金雲翹傳》（*Truyện Kiều*）。

所以，喃字從產生到自成系統，也是經歷漫長的演變過程。從現存實物考證，喃字



圖一 越南佛經中的喃字

■

¹⁴ 據學者依考古材料統計，陳朝前後頒布的避諱字，包含：李、承、烱、吟、晃、熒、妙、瑩、歆、魏、珠、柳、月、濕、南、乾、蘇、俊、英、穎、其等，參見阮金茫，〈越南寧平省陳朝碑刻避諱字研究〉，發表於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屆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釜山：慶星大學，2015年，頁3。

¹⁵ 夏露，〈字喃：越南人無法拋棄的遺產〉，《漢字文化》4，2004年，頁35-36。

¹⁶ 羅長山，〈試論字喃的演變規律及其消亡的社會原因〉，《東南亞縱橫》3，1990年，頁21-27。

的發展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十一世紀初的李朝起到十三、四世紀的陳朝，是喃字產生和形成時期。第二階段，十五、六世紀的後黎朝時期，是喃字的鞏固發展時期。第三階段，十七世紀後黎朝晚期到阮朝，是喃字發展的成熟時期。¹⁷但這是一種分法，並非定論。

越南喃字出現的原因，一般認為有兩個，第一是因為生活上的需要，越南雖然長期屬於中國藩屬，但是語言使用上有所不同，尤其是越南當地的人名、地名，雖然有讀音，但是無法用漢字對譯，所以必須要運用漢字來創作出新的詞彙。¹⁸其次是經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追求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¹⁹其所表現的民族精神，在於漢字傳入越南後，越南人民不甘臣服於漢文化之下，故在反抗過程中為了擺脫漢字的使用，或是強調自我獨立的表現，創造一種屬於越南的民族文字，因此才借用漢字及漢字的偏旁部首，創造出新的一種書寫形式，跟漢字類似的方塊文字，就是漸漸發展出來的越南喃字。

不過，當時越南的統治階層仍以漢文為尊，官方並不重視喃字。²⁰另一方面，國家的教育機構也不以喃字為公文書文字，也沒有對喃字進行整理工作。儘管後來的胡朝（1400-1407）或者是西山阮朝（1788-1802）的統治者曾經重視喃字，但也沒有將它提昇到國家文書用字的地位，使得使用的層面不廣。其次，普及平民百姓的困難在於學習的門檻，由於

■

¹⁷ 何九盈等人所編，《中國漢字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00。目前越南發現的最早的字喃實物是建於李英宗寶應十一年（1173）的〈奉聖夫人黎氏墓碑誌〉，參見夏露，〈字喃：越南人無法拋棄的遺產〉，頁35-36。

¹⁸ 阮黃英，〈漢字文化圈的越南語言文化〉，《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12，2017年，頁104-112。

¹⁹ 陳文源，〈13-15世紀安南的國家意識與文化取向〉，《世界歷史》6，2014年，頁17-26。

²⁰ 夏露，〈字喃：越南人無法拋棄的遺產〉，頁35-36。

喃字大部分都是以形聲造字，所以必須先學會漢字才能懂通喃字。²¹不過，字喃比漢字更易表達越南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十五世紀之後，許多越南的文人在用漢字寫作時，也紛紛採用字喃創作。²²

在佛經方面的喃字化則更晚一點，較早開始喃字化是以喃字註釋佛經為起點，在十五世紀刊刻的《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中經文旁邊註釋有喃字，目前還沒有發現更早的文獻資料，這可能與刻書技術較晚發展有關。²³

十七世紀之後許多越南僧人從事佛經的喃字化，其原因與上述的生活需要因素較為相關，主要是各地寺廟的信眾多為普通老百姓，誦讀佛經時改以當地的語言發音比較能清楚表達，人民的接受度也會比較高，否則使用漢字音朗誦經典，相信能聽得懂的人不多。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位，一是十七世紀的慧燈真源（1647-1726）和尚，一是十九世紀的福田和尚。

慧燈真源和尚，1647 年出生於越南海陽省，十九歲出家後禮明良禪師求法，成為越南臨濟宗拙公禪派的第三代傳人，並承接安子山竹林禪派的法脈。一生致力於佛教的發揚，不僅重建安子山的花煙寺，也倡刻佛經，以及使用喃字撰寫佛經。²⁴其主要著作有：《安子山陳朝禪宗指南傳心國語行》、《悟道因緣》、《尊師發策登壇授戒》、《迎師閱定科》、《龍

²¹ 阮進立，《漢字與喃字形體結構比較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7。

²² 夏露，〈字喃：越南人無法拋棄的遺產〉，頁 3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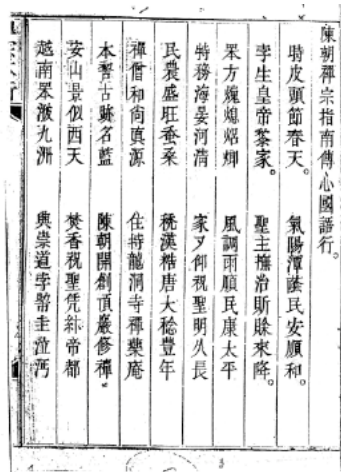
²³ 清水政明，〈字喃資料による 15 世紀ベトナム語音韻体系の再構成：試論〉，「東南アジア学会関西例会」會議報告/口頭発表，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2010/12/11，頁 1-14。

²⁴ 釋行心，《越南永嚴寺喃文《安子山陳朝禪宗指南傳新國語行》木刻版本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頁 42-43。

舒淨土文序》、《龍舒淨土論跋後序》、《淨土要義》、《達摩太子行》、《禪寂賦》、《南海觀音本行國語》、《紅蒙行》、《見性成佛》。²⁵其中用喃字書寫的有《安子山陳朝禪宗指南傳心國語行》、《南海觀音本行國語》，一本是代表竹林禪派禪學的重要典籍，另一本是影響越南民眾甚大的觀音信仰著作。

其次是福田和尚，他的著作甚多，在漢文著作部分大致可以分為：自己所撰寫的著作，如《放生戒殺文》、《三寶弘通》。其次是將原有的典籍重新校訂編輯出版，如：福田和尚校訂《大南禪苑傳燈輯錄》、編輯《在家修持釋教源流》、編輯《道教源流》、編輯《禪苑傳燈錄》、校訂《解惑編》。另外，他也非常努力倡導重刻重要典籍，例如：福田和尚再版《大方便佛報恩經注義》、福田和尚付梓《佛祖統紀》、福田和尚刻印《金剛彌陀偈咒箴銘》、福田和尚重印《鼎湖山志》、福田和尚再版《繼燈錄》、福田和尚等人主持刊刻《顯密圓通》。²⁶

而在喃文著作部分，是以原有典籍進行喃譯為主，例如：福田和尚演音《三教一原解音》、喃譯《沙彌律儀解義》、喃譯《菜根譚》、演音



圖二 《安子山陳朝禪宗指南傳心國語行》

■

²⁵ 釋行心，《越南永嚴寺喃文《安子山陳朝禪宗指南傳新國語行》木刻版本研究》，頁 43-44。其中的《南海觀音本行國語》，在釋行心的論文中寫為《南海觀音本行》，但漢喃院的版本名為《南海觀音本行國語》，歸為喃文書，應該是同一本。參見《南海觀音本行國語》，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550。

²⁶ 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http://140.109.24.175/pasweb/default.asp>，2019/4/22。

《護法論》、編輯《觀音經》。²⁷從兩方面比較起來，雖然漢文著作較多，但是可以表達其佛學思想的還是以喃文著作為主。

而相關人士進行佛經典籍喃文化的工作，持續至二十世紀初仍然還有，例如：《香山觀世音真經新譯》一書即是在維新己酉年（1909）由喬瑩懋所喃譯。²⁸由此可見，漢傳佛教典籍傳入越南之後，受到當地人民的生活需要，以及為了展現其語言的獨立特色，區別與漢文的不同，發展出的喃字，也被應用在佛經典籍上，而從其喃譯的佛教典籍來看，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讓一般民眾可以聽得懂，以利於佛法傳播的實用功能，遠超過所謂的民族精神。

（二）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改編

佛教典籍內容被改編的狀況更多，其中在不同政權的影響之下，越南本身也有避諱字的問題，所以，就算佛教典籍是按照中國傳過去的原本翻刻，但是遇到避諱字還是會修改，不會依照經書上的字樣刻印，這是不得不的做法，然而也因為這個原因，有些經書刊刻年代的斷限，有時可以此為依據，因為一旦經書中出現某些特殊時期的避諱字，自然就可以判斷其刊刻或是重新刊刻的時間必定是在避諱字出現之後，這種狀況在阮朝時期所刊刻的經書最為常見，這可能與當時朝廷管制較嚴有關。²⁹後黎朝時期刊刻的經書，這種情況較少，可能因為留下來的經書不多，以及當時審查不這麼嚴格，故有些經書不太看得出有避諱字。

■

²⁷ 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http://140.109.24.175/pasweb/default.asp>，2019/4/22。

²⁸ 《香山觀世音真經新譯》，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271。

²⁹ 何婧，〈淺談越南漢籍中的避諱字——以嗣德三十年會庭文選為中心〉，《漢字文化》6，2015年，頁66-68。



圖三 日（左）、韓（中）、越（右）刊刻《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之對照

其次，由於越南人民對於佛教信仰的接受與認知不同，會將漢地傳入的佛教典籍進行修改的需要，這在東亞各國都有相同的情況出現，但似乎越南的更動較大，以《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為例。日本江戶時期版本，基本上只有單純的經文，沒有太多添加的內容。其次是韓國的版本，基本上也是沒有太多的添加內容，僅在內文前後增加韓文翻譯文字。而越南本的第一頁則是從「梵讚」開始，前面總共有九頁的儀軌，第十頁才開始經文內容。

可以看出，越南強調佛經的儀式唱誦為首要功能，故不少佛教典籍都會將儀軌或是密咒真言加在頭尾當中，以利進行儀式時使用。不管是早期於景興乙丑年（1745）間所重新刊刻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或是維新五年（1911）至保大四年（1929）所刊行的《大寶積經》，都同樣在經文前面添加有淨口業真言、淨身業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養真言、開經偈等。³⁰這種習慣從後黎朝一直到法國殖民時期依舊存在，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代表越南對於漢傳佛教典籍改編的一種特殊風格。

■

³⁰ 參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254；《大寶積經》，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66/1-24。

但是有些佛教典籍還是依照舊有的格式重新刊刻，並未重新編排增添。例如：武江縣扶朗社永福寺重印於景治七年（1669）的《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則無添加儀軌所用的香讚、咒語真言與開經偈等文字。³¹所以，改編漢傳佛教典籍與否，與越南當地人民的需求有關，有些經書是要用來唱誦宣講的，當然必須有所變動以適應當地的習慣，而有些經書可能僅供僧侶或是知識份子閱讀，即使重刻刊行往往是依照舊有版樣，並未多做變動，除了避諱字之外。

（三）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創造

越南創造佛教論典的歷史相當長久，尤其是陳朝皇室所建立的竹林禪派，基本上已經是相當本土化的佛教派別，雖說受到中國禪宗影響，但是對於佛教義理的見解與禪宗修行法門都有所不同。雖然，從李朝到陳朝都有向中國求取大藏經的紀錄，甚至後來有進行翻刻大藏經的計劃，但是由於戰亂與環境的因素，幾乎難以保存下來。其中，竹林禪派由於獨佔鰲頭，故其祖師大德所創作的典籍，因而流通較廣，故得以保留下來。在潘輝注（1782-1840）所寫的《歷朝憲章類誌・文籍誌》中記錄有當時的書目，其中與佛教相關的書籍有：

《陳太宗御集》一卷，《陳聖宗詩集》一卷，《陳仁宗詩集》一卷，《大香印詩集》一卷仁宗撰，《水雲隨筆》一卷英宗撰，《斷策錄》一十卷僧法螺撰，《玉鞭集》一卷僧玄光撰，《悟道集》一卷僧喜慶撰，《國卷集》二卷僧寶覺撰，《課虛錄》一卷陳太宗撰，《禪林鐵嘴語錄》一卷，《僧伽碎事》一卷，《石室寐語》一卷陳仁宗撰，《僧家雜錄》一卷僧寶覺撰，《禪畹集》六卷陳時人撰，《南溟禪錄》三卷不知何人作，《法事新文》一卷陳英宗興隆七年命

■

³¹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5。

儒臣校訂印行，《藥師十二願文》、《參徒顯訣》一卷僧圓照撰，《釋道科教》一卷、《南宗法圖》一卷僧圓照撰，《法事齋儀》僧惠生撰。³²

這些書籍目前幾乎已經亡佚，流傳於後世最著名的為陳太宗所撰的《課虛錄》，為代表當時陳朝的禪學思想主要著作而廣為流傳，但是竹林禪派的第一祖陳仁宗的著作雖在上述有記錄，但後來多已亡佚，僅有少部分留存於其他著作之中。這些學有專精的僧人，所著作的典籍就如同漢傳佛教典籍中祖師大德們的論著是一樣的，其代表的意義在於當時的越南人對於佛法或是禪學的理解與詮釋，雖是創作，但也沒有離佛法太遠。

除此之外，越南也有另一種類型的佛教典籍創作，這與中國長期來的疑偽經是雷同的。不過，目前發現的越南佛教典籍的疑偽經數量並無詳細的統計，³³但其中以《禮五百觀世音名儀》最為著名，其原因在於越南人對於稱念觀世音名號有所偏愛。³⁴此部經典與《高王觀世音經》類



圖四 《禮五百觀世音名儀》

■

³² 參見潘輝注，〈文籍誌〉，《歷朝憲章類誌》卷 42-45，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c.807（原編號為 A. 50）。書目乃自行抄錄於上述卷中，不一一羅列頁數。

³³ 增尾伸一郎，〈ベトナムにおける偽經と善書の流伝□ 仏道儒三教と民間信仰の交渉をめぐって〉，《「偽」なるものの「射程」》，千本英史編，東京：勉誠出版，2013 年，頁 56-86。該文有粗略統計過，但《禮五百觀世音名儀》未列其中，應是疏忽。

³⁴ 《禮五百觀世音名儀》，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06。

似，同樣對於觀音信仰在越南發展有很大貢獻。³⁵現存最早的刊刻本雖是明命二十一年（1840）的印本，但是有學者認為「五百觀世音名」的信仰在越南出現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景盛五年（1797）重刻慧燈真源和尚所撰寫的《水陸諸科》之前，因為他在文中提及對於觀世音菩薩的功德時：「因修六度，果證一乘，誓願弘深，如大海之汪洋不測，慈悲廣大，若長天之覆燾無垠。顯不壞身廣發十二願，歷無量劫靈感五百名」。³⁶可見當時慧燈真源和尚認為觀世音菩薩擁有五百名化身，只是未將其名號具體寫出而已。

這樣的推論或許可以說明觀世音菩薩在越南的信仰轉變已由中國所傳入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形象，出現更具體的五百名號等同於五百位觀世音所組成的千手與千眼。³⁷然而，慧燈真和尚所提到的「歷無量劫靈感五百名」是否與《禮五百觀世音名儀》有關，目前證據仍顯薄弱，主要是從慧燈真源和尚之後到明命年間似乎並沒有太多相關資料可以印證。

以上述這樣的方式去編造佛教典籍，還是比較特殊的，通常比較常出現的方式，是將漢傳佛教典籍進行內容的整編比較多，例如，戒律方面以及淨土典籍。在戒律典籍部分，例如：僧人園覺撰，《比丘尼戒律集要諸儀》、僧清覺序刊本《諸經律》等。³⁸另外，淨土典籍也是越南整編的重點，加上為了誦讀，故又經常將其譯為喃文，例如：《因果諸經

■

³⁵ 于君方，〈「偽經」與觀音信仰〉，《中華佛學學報》8，1995年，頁116。

³⁶ 《水陸諸科》，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AC. 691/1-6。

³⁷ 參見釋源德，〈越南的觀音信仰研究〉，《佛學研究》1，2018年，頁201-211。越南陳朝即有崇拜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信仰。

³⁸ 《比丘尼戒律集要諸儀》，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AC. 459；《諸經律》，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A. 2478。

摘要演音》、河內安宅村闡法寺性定禪師演音《龍舒淨土演音》等。³⁹只是這樣的經書整編對應於越南本身的需求仍有所不足，為了有較完整的教法學習，應設法取得整套大藏經，但這對於刻經工作已分散至各寺的現狀，不是單獨寺院可以承擔的工作。不過，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至少有一個寺院 □ 細川寶龕寺曾經做過佛教經典的計畫性出版，以建立一套越南淨土修學法門（見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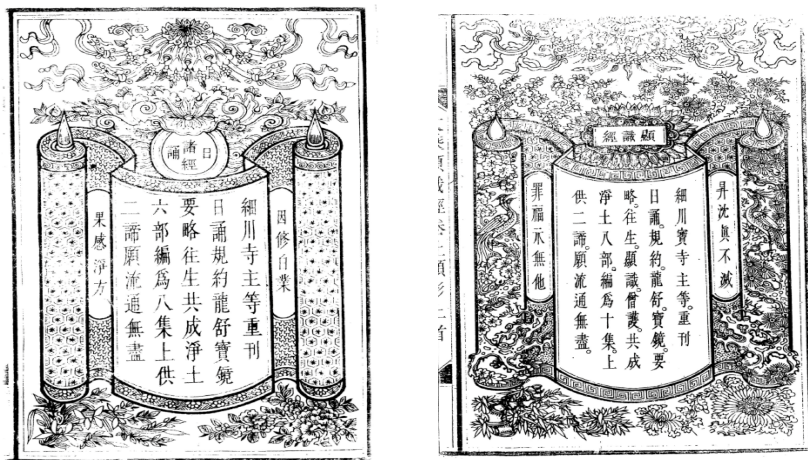
三、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

這種改變原本漢傳佛教典籍的章節編排或整合內容文字，本文將其稱為越南佛教典籍的「轉化」；所謂的轉化，除了以漢傳佛教典籍為基礎之外，也會因應越南本地的需求作出轉變或是修改。

以細川寶龕寺為例，該寺就曾重刻出版八部典籍分成十集，建立越南淨土法門的修學文獻。此八部典籍分別為：《諸經日誦》、《雲棲規約》、《龍舒增廣淨土文》、《寶鏡》（目前難斷定為何經）、《沙彌律儀要略增注》、《往生集》、《大乘顯識經》、《僧護經》，因為是同系列的計畫性重刻，所以，細川寶龕寺的版本在其首面都會一個特殊的牌記，如圖五。

左邊為《諸經日誦》的首面，初期時僅刊刻六部經書而已，並未包括《大乘顯識經》、《僧護經》。牌記中央的圖樣為捲軸，內有文字說明重刊的經書名以及部集數，捲軸上方正中央有寫該書的經名，但《大乘顯識經》僅寫「顯識經」而已，未寫出全名。而為何細川寶龕寺會將這些經書刊刻成一套，並視為淨土典籍，目前並未發現有針對此問題的詳細說明，僅有嗣德二十九年（1876）寶龕寺清志寫「重刊諸經日誦序」時提及該經：「寔利初門行道也歟。然此書流本國，黎景興海欽已刻板

³⁹ 《因果諸經摘要演音》，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351；《龍舒淨土演音》，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94。



圖五 越南細川寶龕寺刊本牌記

於覽山，仍其年深印者將缺，於是後學蒙恆維自願擬舊而新，復加有典，要務焚修者，逐類以添足，竝流於禪苑」。⁴⁰大概可以推測，當初重刻或許只是為了方便後來的修學者，可以容易取得相關的經書來研讀修行，並同時刊刻了《雲棲規約》、《龍舒增廣淨土文》、《寶鏡》、《沙彌律儀要略增注》、《往生集》等書，以便能夠按照這些經書逐步來進行淨土法門的修行工作。只是在所列的典籍中，漢傳佛教通常不把《雲棲規約》、《沙彌律儀要略增注》等戒律方面的論典歸為淨土書籍，但若視為出家眾基本的戒律修行也並非不可，只是《大乘顯識經》與《僧護經》主要是因果善惡警示之書，後來為何增列入該批典籍則有待考察。

而在永嚴寺其實也有類似重刊佛經的規劃，只是目前發現的數量不多，在漢喃院存有嗣德三十四年（1881）永嚴寺沙門心圓重校的《式叉摩那沙彌律儀》一書，其首面也是有類似的牌記，牌記中央有「眾等代為校書刊比丘尼戒經等，共成二集，上供清眾，願流通無盡」等字樣，

■

⁴⁰ 《諸經日誦》（嗣德二十九年重印本），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01。

上方有「毗尼藏」三字，旁邊除了花紋不同之外，基本上與細川寶龜寺相同，重刊年代也差不多。⁴¹只是該書是屬於重校，故有大量校勘更動之處，沙門心圓在〈重校緣起〉：「復念佛度五眾，各有律儀，我今發心，亦應平等，由是細玩諸本，互見乖違，始定重校重刊，以遂普心普利」。⁴²可見其所使用的戒律本並不是只有一種，而是利用多種典籍來校勘，這在其內文中經常看見，對一個文句的說明參考《戒本如釋》、《毗尼切要》、《羯摩本》等流通於當地的戒律書來重新解釋。這可能與越南長期接受漢傳佛教典籍的影響之後，也慢慢發展出本地佛教徒對於經典的認識，當地的高僧可以透由自己的詮釋角度，嘗試提出適合當地僧尼學習與需求的論著。

所以，有另一種對於漢傳佛教典籍內容更動較大的轉化類型是重新編注本，這類的論著通常是比較晚期才出現的居多，這與早期出現將經書翻譯成喃文有所不同，主要在於後期典籍較多，可以作為互相參照之用，例如：《歸元直指增補音義》（*Quy Nguyên Tr ực Chỉ Tăng Bổ Âm Nghĩa*）至少參考補陀寺舊本、永嚴寺抄本，其音義部分幾乎以增補者對於佛法名詞的理解進行注釋。⁴³

另外，保大四年（1929）序刊本的《大寶積經》在重刊時除了使用越南當地的舊版本，還加上法國河內遠東博古學院所藏的日本版本，以及福林寺的比丘心智所得的北本（中國版本），利用這三個版本進行校勘，雖然文中沒有大量註釋，但是同時以南本、北本與日本三種版本進行校對，顯示越南僧人已不再單純以北本為尊，而是從義理上去判斷經

⁴¹ 《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65。

⁴² 心圓，〈重校緣起〉，《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65，頁 1。

⁴³ 〈書刊歸元直指增補音義敘引〉收入《歸元直指增補音義》，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67，頁 1-4。文中對於該書體例有所說明。

文，因此〈敘引〉云：「茲因既有三本，理可鼎新，萬一有殊，對三取正，舉我比丘通命、清恕，參合比讐，字若有差，義從以定」。⁴⁴這大概是越南僧人對於漢傳佛教典籍最大的應用與轉化，已不單純是喃字化翻譯或是重新編制典籍而已，甚至比創造出「仿佛經」□ 《禮五百觀世音名儀》——偏重儀軌唱誦的用書，更能顯示越南僧人不僅擺脫過去依賴漢傳佛教典籍的觀念，也呈現出其成熟的佛教義理思想，而這一部分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然而，到了法國殖民時期官方積極推行越南語羅馬字化，使得相當依賴漢文理解的漢傳佛教典籍漸漸為人所遺忘。直到十九世紀末，越南佛教界才開始重新思想應該有一套自己的越南大藏經，但是利用現代越南語所翻譯出來的佛經，其水平等級是否能比得上熟稔漢傳佛教典籍的早期僧人，不無疑問。

四、結論

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實際上是代表越南佛教本土化的過程，所以在不同時期會有不一樣的形式出現，其中或許會有一些個別性的差異，但是初期還是以仿製為主，更動較少，版本形式以原來所取得的漢傳佛經為模本，依其原樣翻刻，更動地方以避諱字為主，或是更動每頁的行數、每行的字數而已，基本上是維持原樣。所以，不少從中國傳入的「嘉興藏版」佛經，仍舊可以從後來越南重新刊刻的佛經比對中，發現其版本源自於中國，這以性泉法師所帶回的佛經最具代表性。當時所帶回的佛經有些甚至保留「嘉興藏版」的牌記，內容仍使用明朝年號，相關鐫刻人物仍保留中國當地人名，比對現在的「嘉興藏版」佛經甚至完全一致。

然而，隨著漢傳佛教典籍的傳入之後，越南本地的佛教僧人以及民

■

⁴⁴ 《大寶積經》，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66，頁 5-8。

眾的不同需要，也會進行佛經的重刻，這時會因應不同的需求，對於傳入的佛經進行重新編排，尤其是為了儀式的需求，會改變成越南需要的形式，增加入一些越南僧人或是民眾所習慣的方法。這通常表現在佛教經典的儀軌化，為了越南僧人的唱誦之需求，會添加一些咒語的內容。此與越南佛教受到密教化的影響有關，越南雖然表面上會認為深受中國禪宗影響很大，甚至出現竹林禪派，但是觀察其所使用的佛教典籍，許多經典經常受到密教的影響，增加許多咒語類型的經文，不管是其咒語是受到中國影響，或是越南當地所創造的咒語，都顯示漢傳佛教典籍受到越南本土化而有所改變。這部分的典籍雖然與中國傳入的有所不同，但是大體上還是延續中國的形式，有些甚至還可以辨認出是源自中國，只是段落篇章有所更動或增補。

不過，越南漢傳佛教典籍最大的轉化在於「仿佛經」的出現，在中國同樣有「偽經」的問題，通常可以利用歷代佛經目錄做最初步的判斷，但是在越南基本上沒有這類的佛經目錄可以作為依據，僅能依靠中國的佛經目錄與流通狀況來協助對越南漢傳佛經的判讀。另外，越南除了早期從印度來的僧人，例如康僧會等人曾經在當地翻譯佛經之外，基本上沒紀錄過越南有直接翻譯佛教典籍的訊息，當然這不包含現代越南正在進行的越南版大藏經翻譯工作。所以，若是在中國漢地找不到的佛經，我們大概初步可以判定其為「仿佛經」的可能性極大，例如：《五百名觀世音經》等。但是，這些佛經在越南基本上還是被一般民眾認為是傳統佛經，沒有太多的懷疑，甚至對其信仰虔誠，受其影響不輸傳統漢傳佛經。

另外，還有一類以漢傳佛教典籍為基礎的創作，與中國漢地祖師大德的論著相類似，例如：《歸元直指增補音義》等書。這類的典籍不似「仿佛經」以模仿佛經形式為目的，會清楚地在重新刊刻的序文中，講述其原由，雖然依照原有典籍形式編排，但會寫明其引用的版本，以及

本次重刻時所加入的內容為何，以及目的。這類的再製典籍顯示的是越南佛教僧人對於漢地佛教典籍的承襲，以及其本身對於佛教教義知識的成熟與佛學理解的水準，已經有足夠的能力，開拓出屬於越南佛教特色的註釋書，漸漸可以擺脫漢地佛教思想為主的知識觀，走出一條屬於自己對於佛教理解的新道路。



引用書目

一、佛教典籍與古籍

- 《諸經律》（*Chư Kinh Luật*），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 2478。
- 《龍舒淨土演音》（*Long Thư Tịnh Độ Diễn Âm*），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94。
- 《香山觀世音真經新譯》（*Hương Sơn Quan Thế Âm Kinh Tân Dịch*），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271。
- 《因果諸經摘要演音》（*Nhân Quả ở Chư Kinh Trmch Ýu Diễn Âm*），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351。
- 《南海觀音本行國語》（*Nam Hải Quan Âm Bản Hạnh Quốc Ngữ*），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B. 550。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Kim Cương Bát Nhã Ba La Mật Kinh*），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254。
-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直說》（*Bát Nhã Ba La Mật Đa Tâm Kinh Trực Thuyết*），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01。
- 《禮五百觀世音名儀》（*Lễ Ngũ Bách Quan Thế Âm Danh Nghi*），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06。
-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Phật Thuyết Mục Liên Vấn Giới Luật Trung Ngũ Bách Kinh Trọng Sự Kinh Tân Sớ*），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15。
-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Đại Phương Quảng Viên Giác Liễu Nghĩa Kinh Lược Sớ*），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396。
- 《比丘尼戒律集要諸儀》（*Tỳ Khưu Ni Giới Luật Tập Yếu Chư Nghi*），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59。
- 《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Thức Xoa Ma Na Sa Di Ni Luật Nghi*），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65。
- 《歸元直指增補音義》（*Quy Nguyên Tr直指 Tăng Bổ Âm Nghĩa*），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467。
- 《諸經日誦》（*Chư Kinh Nhật tụng*），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01（嗣德二十九年重印本）。
-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Đại Phương Quảng Viên Giác Liễu Nghĩa Kinh Lược*

Sớ)，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27。

《萬法指南》(*Vạn Pháp Chỉ Nam*)，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53。

《大寶積經》(*Đại Bảo Tmch Kinh*)，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66/1-24。

《水陸諸科》(*Thủy Lục Tôn T ập*)，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AC. 691/1-6。

《歷朝憲章類誌》，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c. 807 (原編號為 A. 50)。

《梁大王》抄本，越南漢喃院館藏，編號 VHv. 1845。

現代專書、論文

于君方，1995，〈「偽經」與觀音信仰〉，《中華佛學學報》8，頁 97-135。

何九盈等編，1995，《中國漢字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何婧，2015，〈淺談越南漢籍中的避諱字□ 以嗣德三十年會庭文選為中心〉，《漢字文化》6，頁 66-68。

李貴民，2019，〈越南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初探〉，《佛光學報》新 6：1，頁 279-320。

阮金茫，2016，〈越南寧平省陳朝碑刻避諱字研究〉，發表於世界漢字學會第四屆年會：「表意文字體系與漢字學科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釜山：慶星大學，後收入《中國學》56，大韓中國學會編，頁 71-83。

阮進立，2009，《漢字與喃字形體結構比較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阮黃英，2017，〈漢字文化圈的越南語言文化〉，《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12，頁 104-112。

阮蘇蘭著、阮黃燕譯，2011，〈越南封建時代國立圖書館略考〉，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冊 2，臺北：樂學出版社，頁 245-264。

夏露，2004，〈字喃：越南人無法拋棄的遺產〉，《漢字文化》4，2004 年，頁 35-36。

清水政明，2010，〈字喃資料による 15 世紀ベトナム語音韻体系の再構成：試論〉，「東南アジア学会関西例会」會議報告／口頭発表，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頁 1-14。

陳文源，2014，〈13-15 世紀安南的國家意識與文化取向〉，《世界歷史》6，

頁 17-26。

増尾伸一郎，2013，〈ベトナムにおける偽経と善書の流伝□ 仏道儒三教と民間信仰の交渉をめぐって〉，千本英史編《「偽」なるものの「射程」》，東京：勉誠出版，頁 56-86。

劉玉琚，2007，《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羅長山，1990，〈試論字喃的演變規律及其消亡的社會原因〉，《東南亞縱橫》3，頁 21-27。

釋行心，2017，《越南永嚴寺喃文《安子山陳朝禪宗指南傳新國語行》木刻版本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釋清決，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十一卷 越南佛教（從佛教傳入至公元 20 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釋源德，2018，〈越南的觀音信仰研究〉，《佛學研究》1，頁 201-211。

網路資源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網址：

<http://140.109.24.175/pasweb/default.asp>，2019/4/22。

